

唐代史事考釋

黃永年 著

黃永年著

唐代史事考釋

唐代史事考釋

1998年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6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者 黃 永 年
執行編輯 方 清 河
發行人 劉 國 瑞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3620308・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6 4 1 8 6 6 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6 4 1 8 6 6 2
印刷者 永裕印刷・世和裝訂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1502-7(平裝)

黃永年及其唐史研究

汪榮祖、

黃永年先生，江蘇江陰人，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生。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現任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兼該校古籍研究所所長、研究生導師。

我於一九八六年夏天初訪西安時，承永年先生接待，遊覽名勝古蹟，並為他的研究生作了一次報告。但我此行的最大收穫，乃是與永年先生有多次傾談的機會。長安夜話，至今難忘，甚佩他在古典文史學上的造詣。原來，他除本身勤學外，有令人羨慕的師承。他先後為呂思勉、童書業、顧頽剛諸大師的入門弟子，並成為童先生的長婿，海峽隔絕音訊三、四十年，但在臺灣的文史學界，甚至青年學子們，對呂、童、顧三先生的大名，應不陌生，名師出高徒，自非偶然。

黃永年先生學有師承，學有專精，但他的學術道路很不平坦。他於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上海交通大學當政治教師，因為作了些批評，在一九五八年反右運動時被劃作右派，不准做「科研

工作」（大陸用語，即學術研究工作）。幸虧，他被派到圖書館工作，至少可以接觸到書，在「工」餘之暇偷偷地研究唐代歷史與敦煌文書。雖然不准「演武」，仍可偷偷「練功」，此乃一九五八年後二十年間，黃氏的「學術生涯」。

一九七九年後，文革狂風已過，「四人幫」早已垮臺，學術空氣也逐漸放鬆。黃永年先生才從圖書館調到陝西師大歷史系教書，不久成爲該校唐史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在此之前，他沒有職稱，一九八一年才任副教授，第二年就升任教授。一九八三年後，陝西師大新設古籍研究所，黃先生就任副所長，近已升任所長，正爲古籍研究與培養專才作出貢獻。

所以，黃永年先生放手做學問，指導研究生，發表論文，是遲至一九七九年後才開始的，但不到十年，成績斐然。從這一點看，一九七九年前的一、三十年光陰，對他而言，並未完全浪費。之所以如此，因他在不利學術的環境下，一直沒有放棄學術——不准研究，他偷偷地看書；不准發表，他把心得做成筆記。因此，似乎是虛度的歲月，卻不斷在累積學術的本錢。一旦雨過天青，開放學術研究，黃先生自然成爲學術界的「萬元戶」了。

一九七九年以後，黃永年先生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唐史的論文，考釋細密，饒有見解，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注目。永年先生告訴我，他研究唐史頗得陳寅恪先生著作的啟發。因他敬佩陳先生，所以注意到我所寫的《史家陳寅恪傳》。承他說，他對陳先生的看法與我頗有相同之處。但他並不迷信學術權威，他受陳先生的啟發之後，也看出陳先生論點未盡妥適之處，並爲文商榷（請參閱本書，《敦煌寫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宮庭政變中的玄武門》、《說李武政權》、《開元天寶時所謂武氏政治勢力的剖析》、《羯胡柘羯雜種胡考辨》、《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

與胡之關係」諸篇）。據永年先生說，有些師友因而有所誤會。此令我感到，不敢或不願碰學術權威與文革時一筆抹殺學術權威，同樣是一種極端，並不足取。黃先生亦因此經常鼓勵他的研究生盡量提出異議，他認為學生一定要能超過老師，才能後來居上，學術才有進步。我讀黃氏與陳氏商榷的文章，絲毫覺察不到有不尊敬的地方，大都是對陳氏說法的補充與修正，可說是陳氏的功臣。如果陳氏地下有知，必定欣賞這位受他啟發的後學及其所作的貢獻。

本書可說是黃永年先生唐史研究的一個總結。所收三十三篇文章，雖大都曾在學報上發表過，但經作者重新校閱，並作增訂。而且，各篇文章在時序與內容上，相互貫通，自成系統，不啻是一部唐代政治史專題研究，具有完整的主題與範圍，與一般文集在性質上，並不相同。

黃永年先生在唐史研究上，已經作出可觀的成績，用現代的話說，他可稱唐史專家。但專家一詞對他來說，並不適合，因他對中國古典文史之學有廣泛的興趣和成就，於小說、詩詞、書法、版本等方面都已有著述，以後可另外結集出版。

我還可向讀者報告的是，黃永年先生是一個標準的愛書人。他自小喜歡買書，至今藏有不少善本精刻。文革風暴一起，人家把他的藏書貼上封條，反逃過紅衛兵的抄刦。藏書封了，但他仍不免時時心驚手癢，冒著風險，揭開封條，偷看藏書。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那種驚弓之鳥的竊喜心情，也可以理解到為什麼這幾年來，永年先生不知老之將至，加倍地努力作學術工作。我個人特別高興，他的才學與科研成果，終於獲致大陸學界的高度評價。今將黃永年先生的唐史研究成果，輯為一冊，名曰《唐代史事考釋》，以饗臺灣與海外的眾多讀者。

唐代史事考釋 / 黃永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經 , 1998年

面 ; 公分 .

ISBN 957-08-1502-7(平裝)

I . 中國 - 歷史 - 唐 (681-907) - 論文 , 講詞等

624.1007

85000587

目次

黃永年及其唐史研究 ······ 汪榮祖(一)

上編

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鬭爭	三
敦煌寫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宮庭政變中的玄武門	三七
李勣與山東	五七
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	七五
說李武政權	九三
開元天寶時所謂武氏政治勢力的剖析	一一九

唐代河北藩鎮與奚契丹	一三三
《通典》論安史之亂的「二統」說證釋	一六五
「羯胡」「柘羯」「雜種胡」考辨	一八七
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係	二〇一
論安史之亂的平定和河北藩鎮的重建	二二一
說馬嵬驛楊妃之死的真相	二二九
〈長恨歌〉新解	二三九
唐肅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肅代兩朝中樞政局	二七一
論建中元年實施兩稅法的意圖	二九七
唐代兩稅法雜考	三一五
「涇師之變」發微	三三七
所謂「永貞革新」	三七三
唐代的宦官	四〇一
下編	
唐代籍帳中「常田」「部田」諸詞試釋	四五
唐天寶宣城郡丁課銀挺考釋	四六九
考唐長安城內兩個缺失的坊名	四八五

說餅——唐代長安飲食探索	四九一
唐代家具探索	四九七
釋敦煌寫本《雜鈔》中的「面衣」	五一三
讀唐劉濬墓志	五一九
《全唐文·楊妃碑記》偽證	五三七
《纂異記》和盧仝的生卒年	五四三
《浣花集》和《秦婦吟》	五五五
述《類編長安志》	五八七
《三夢記》辨僞	六〇七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正義	六二一
佛教為什麼能戰勝道教——讀《太平廣記》的一點心得	六三七

上

編

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鬭爭

唐代的黨爭，也就是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鬭爭，一般只講中晚唐，只講所謂「牛李黨爭」，早一點也只從高宗、武則天時講起。其實作為封建統治集團，其內部矛盾和鬭爭是無時不存在的。武德時李淵、李世民、建成、元吉父子兄弟之間的鬭爭，貞觀時太子承乾、魏王泰之間的鬭爭，實際上都是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派系或小集團之爭，是唐朝初期主要的黨爭。這是本文要說明的第一點。

第二點，用什麼來分析和解釋當時的黨爭。有人用地域來解釋，說這是關隴人和山東人之爭。有人不同意，認為這種矛盾應該是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之間的矛盾。我認為，這些解釋都失在求之過深。地域以及世族、庶族等問題，歷史研究工作者是應該考慮的，但作為統治集團內部的黨爭大多數還只是權力之爭，派系或小集團並非都按地域或世族、庶族來結合，不能用世族、

庶族或地域來判斷一切，決定一切。

一 裴寂劉文靜之爭

唐高祖李淵於隋大業十三年在太原起兵，進入長安，第二年稱帝，改元武德，到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門之變後立次子秦王李世民為太子，八月內禪，李世民成為皇帝，即歷史上著名的唐太宗，第二年改元貞觀。在武德年間秦王李世民和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矛盾是讀史者所知道的，但很少考慮到李淵、李世民父子之間的矛盾。其實這個父子矛盾早在武德初年就存在，當時朝廷重臣裴寂和劉文靜之爭，就是這個矛盾的初步公開化。

裴寂、劉文靜都是開國元勳，兩《唐書》都是以裴劉合傳居功臣傳之首。其實此二人各有其政治背景。裴寂是李淵的親信。據《舊唐書》卷五七本傳，隋末任晉陽宮副監，「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延之宴語，間以博弈，至於通宵達旦，情忘厭倦」。「及義兵起，寂進宮女五百人，並上米九萬斛、雜綵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高祖「大將軍府建，以寂爲長史」。高祖入長安爲大丞相，又「轉大丞相府長史」。「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飾，不可勝紀，仍詔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爲比」，「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武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寂乞引退，「高祖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爲臺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俄冊司空」。可見裴

寂是高祖李淵身邊最親信的第一號人物。李淵此人雄才大略，讀太原起兵時記室參軍溫大雅所記《大唐創業起居注》可知¹。從隋大業十三年太原起兵到武德九年玄武門之變以前，李淵一直是最高決策者和全局指揮者。裴寂在其中當也建立過別人所不能企及的重大勳業²，才獲得李淵如此高度的親任。所謂「使我至此，公之力也」的話，是無論如何加不到徒知進宮女、論故舊、尋常恩倖之流的頭上。只因玄武門之變後李淵的政權為李世民所奪取，裴寂跟著垮了臺，貞觀朝纂修《高祖實錄》就把太原起兵說成李世民所主謀，統一天下也幾乎全是李世民的功勞，李淵尙被誣為坐享其成，裴寂的作用自然更一概抹煞。後來《國史》以及承用《國史》、《實錄》的兩《唐書》等因之而不改，於是裴傳中才出現只紀恩寵不見勳業的怪現象³。

劉文靜原隋晉陽令，和裴寂同是太原起兵的主要策畫者，裴寂任李淵大將軍府長史時他任大將軍府司馬，裴寂轉大丞相府長史他也轉大丞相府司馬，裴寂拜尚書右僕射他拜納言，是僅次於裴寂的人物。但武德初年他和裴寂有了矛盾。《舊唐書》本傳說：「時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靜奏曰：『陛下君臨億兆，率土莫非臣，……宸位極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所謂「太陽俯同萬物」是借用晉元帝「詔王導升御床共坐」王導推辭之詞⁴，

¹ 《大唐創業起居注》之保存太原起兵、進取長安的真相，包括李淵主謀、建成與李世民同起作用之類，前人已有所注意，見《四庫提要》等書。友人牛致功近更撰專文論述，於此不贅。

² 裴寂不僅為李淵出謀畫策，協助指揮全局，而且從《舊唐書·裴傳》所紀晚年流靜州時能率家僮破山羌來看，在武事上也並非一無所知。

³ 如所謂「公為臺司，我為太上」的「太上」二字，也顯然出於修《實錄》者改篡，玄武門之變前高祖從無內禪之意，武德六年時如何會說準備當太上皇的話。由此可見《實錄》及裴傳之多曲筆。

⁴ 《北堂書鈔》卷一三二引《晉中興書》。

「重臣」則指裴寂，對看裴傳自知。為什麼劉文靜要反對裴寂，連裴寂和李淵同坐共食這點事情都不放過，劉傳下文作了解釋：「文靜向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由是與寂有隙。」好像只是緣妬寵而成仇。其實這只是就事論事，沒有講出事態發生的根子。要真正弄清根子，應該從劉文靜和李世民的關係考慮。這在《舊書》劉傳中並沒有完全隱諱，如一開頭就說：「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托，又竊視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可見太原起兵之前劉文靜和李世民的關係就不平常。以後武德元年七月秦王李世民爲西討元帥拒薛舉，劉文靜爲元帥府長史，十二月秦王李世民拜太尉陝東道行臺尚書令，鎮長春宮以經略山東，劉文靜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鎮長春宮。說明劉文靜確屬秦府早期的私黨，是輔佐李世民的第一號人物。劉、裴之爭，實際上反映了李世民和李淵之間的矛盾。當然，此時李世民羽毛未豐，裴寂決非劉文靜之能動搖。劉文靜借同坐共食事攻擊裴寂而「帝不納」。武德元年拒薛舉戰敗被降了職（先坐除名，後拜民部尚書，而前此之爲納言則是宰相之一）。武德二年因「絕望」「怨言」被殺。當李淵審理此獄時，李世民爲劉文靜疏解，「極佑助之」，李綱、蕭瑀也「皆明其非反」，只因「高祖素疏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粗險，忿不思難，醜言悖逆，其狀已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勁敵，今若赦之，必貽後患。』高祖竟聽其言」。

這實際上是李淵、裴寂爲防止內部出現派系小集團而蓄意剪除李世民的羽翼。李淵、李世民父子之間開始出現了裂痕。

武德九年玄武門之變李世民成爲太子，再迫李淵內禪當上了皇帝，裴、劉舊案當然非翻不可。大概是遵「三年無改父之道」的古訓吧，最初還給成爲太上皇的李淵留面子，敷衍一下裴寂。如貞觀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升金輅」，但當裴寂辭讓時太宗就說：「以公有佐命之勳，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前兩句直截地翻譯起來就是：「你是太上皇的人，無忌是我的人。」已頗見斤兩。貞觀三年就借故把裴寂「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邑」，不久又借故「徙交州，竟流靜州」。同時就在這一年，給劉文靜「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尚公主」，徹底平反。

當裴寂被免官放歸本邑蒲州時，他請求留住京師，李世民不同意，指責他說：「計公勳庸，不至於此，徒以恩澤，特居第一，武德之時，政刑紕繆，職公之由，但以舊情，不能極法，歸掃墳墓，何得復辭！」李世民這段話講到兩點：一、裴寂是武德時國家政刑的全面負責者；二、當時政刑紕繆。第一點是事實，裴寂武德時身爲宰相，而且是宰相中最爲高祖倚重的，武德時一切政刑當然由他輔佐李淵全面負責，這實際上已否定了裴寂「徒以恩倅」之說。第二點則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且連李淵也連帶罵在裏面，和後來朝廷宴會上對太上皇李淵所說「百姓獲安，四夷咸附，皆奉遵聖旨，豈臣之力」云云⁵又矛盾。我認爲後者倒是事實：因爲天下是武德時統一的；奠定建國規模的《唐律》和《唐令》也是武德七年由裴寂等因隋開皇《律》、

⁵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貞觀八年三月甲戌條。